

# 经济研究

Jingji Yanjiu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宏观经济学科课题组：总量态势、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

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

江小涓：市场化进程中的低效率竞争

——以棉纺织行业为例

ISSN 0577-9154



9 770577 915007

03>

3  
1998

#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 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

胡永泰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

##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度量问题

在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测量之前，有必要面对两个夸大官方GDP增长率的度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GDP增长测算必须是建立在一个一致的基年价格水平上；第二个问题是工业部门实际增加值的计算。

官方GDP增长率的计算来自不同基年。例如，以1980年的价格作为计算1981—1990年这一时期增长率的基年价格，以1990年的价格作为1991年以后的基年。由于两个发展阶段上的相互作用，用1990年作基年换算的1990年以前的增长率，将使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长率降低。首先，农产品价格对工业品价格的比率，1990年高于1980年。其次，工业部门在1985—1993年这段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农产品对工业品价格比率的反向运动表明：在1985—1993年这段时期，用1990年作基年价格测量的工业部门的增长率比用1980年作基年价格测量的增长率低。所有在本文中反映的实际GDP(和他们的组成部分)都是以1990年基年价格测算的。表1中的第一列和第二列分别反映了官方测量的增长率与以1990年作基年价格测量的增长

表1

	GDP增长率		单位：% 用出厂价指数 对工业产出部分进行再平减
	官方	用1990年价 作为统一的 基价	
1978	11.70	10.92	
1979	7.60	7.42	7.45
1980	7.81	6.90	7.25
1981	4.48	4.93	4.93
1982	8.25	8.60	8.34
1983	10.44	10.46	10.50
1984	14.56	14.46	14.86
1985	12.89	11.98	10.77
1986	8.48	8.22	8.80
1987	11.12	10.68	8.37
1988	11.24	10.52	8.47
1989	4.34	4.13	-0.16
1990	3.89	4.04	3.34
1991	8.00	8.00	6.94
1992	13.60	13.60	12.37
1993	13.41	13.41	8.89
1979—1993年平均增长	9.34	9.16	8.07
1979—1984年平均增长	8.86	8.80	8.89
1985—1993年平均增长	9.66	9.40	7.53

\* 序列3也是一致地以1990年价为基价

率。用一致的基年价格重新计算，1985—1993年的年均增长率，从官方的9.7%下降到9.4%。

第二个测量不准的问题更严重。工业部门的增长已被官方的统计数据夸大了。工业部门的增加值一般形成如下。每个企业向统计局报上三组材料：现价总产值，基价总产值和现价增加值。然后统计局从前两组数据中形成一个隐含的平减系数，用它缩减第三组数据从而得到基价的增加值。

该度量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基价总产值的申报。经多年中央计划体制运作，国有企业对正确计算这一系列资料是很熟悉的。1984年以后发展起来的集体企业都不甚清楚怎样计算，特别因为基年(直到1990)是1980年，当时许多集体企业还不存在。由于集体企业不受中央部门的监管，他们很少有压力申报真实而准确的序列资料。因此，许多集体企业就用同样的数据上报现价总产出和基价总产出。这不是出于不懂就是出于方便。

表 2

## 构造真实工业产出的不同方法

	GDP 帐户的 工业部分	工业总 产出合计	国有企业 工业总产出	集体工业 总产出	工业产 出出厂价
<b>(一)根据资料计算的工业产出的平减指数(1990=100)</b>					
1978	71.45	69.00	60.85	79.76	55.99
1979	72.38	70.06	62.42	78.10	56.83
1980	72.52	70.60	63.00	78.87	57.11
1981	73.15	70.92	63.35	79.27	57.22
1982	72.99	70.78	63.41	78.52	57.11
1983	73.09	70.77	63.51	78.36	57.05
1984	74.70	71.76	64.75	79.07	57.85
1985	78.15	75.41	68.65	82.08	62.89
1986	81.96	77.80	71.52	83.74	65.27
1987	83.69	81.57	76.05	86.61	70.43
1988	91.47	89.10	84.73	93.10	81.00
1989	97.72	99.17	97.28	100.52	96.06
199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991	103.65	102.88	105.39	99.94	106.20
1992	108.12	105.86	111.75	100.33	113.42
1993	122.76	117.55	134.76	105.78	140.64
<b>(二)按不同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实际工业产出增加值(1990 价格)</b>					
1978	224.93	232.90	264.08	201.49	287.03
1979	244.49	252.59	283.51	226.59	311.42
1980	275.31	282.81	316.91	253.15	349.58
1981	280.03	288.85	323.34	258.42	357.96
1982	296.23	305.48	340.98	275.39	378.62
1983	325.02	335.67	374.05	303.16	416.38
1984	373.38	388.64	430.75	352.71	482.09
1985	441.31	457.33	502.35	420.15	548.41
1986	484.04	509.90	554.67	473.74	607.74
1987	547.92	562.20	603.02	529.50	651.10
1988	631.59	648.41	681.83	620.56	713.27
1989	663.53	653.83	666.54	645.06	674.98
1990	685.80	685.80	685.80	685.80	685.80
1991	780.27	786.09	767.35	809.20	761.50
1992	951.21	971.53	920.28	1025.05	906.75
1993	1151.85	1202.90	1049.29	1336.73	1005.38
<b>(三)工业增加值增长率</b>					
1979	8.70	8.45	7.36	12.46	8.50
1980	12.60	11.96	11.78	11.72	12.25
1981	1.72	2.14	2.03	2.08	2.39
1982	5.78	5.76	5.46	6.57	5.77
1983	9.72	9.88	9.70	10.08	9.97
1984	14.88	15.78	15.16	16.35	15.78

1985	18.19	17.67	16.62	19.12	13.76
1986	9.68	11.50	10.42	12.75	10.82
1987	13.20	10.26	8.72	11.77	7.14
1988	15.27	15.34	13.07	17.20	9.55
1989	5.06	0.84	-2.24	3.95	-5.37
1990	3.36	4.89	2.89	6.32	1.60
1991	13.78	14.62	11.89	17.99	11.04
1992	21.91	23.59	19.93	26.67	19.07
1993	21.09	23.81	14.02	30.41	10.88

用基年价格总产出资料的另一问题是,这种统计制度对待新产品的缺陷。这涉及到基年价格怎样估计它所对应的数量贡献。例如,多少 286 主机相当于一个奔腾主机及运作能力。对这种复杂情况,企业通常的做法就是把按现价计算的新产品的价值等同于按不变价计算的价值。新产品实际价值被夸大的做法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统计报告中都有反应。

所有这些对真实总产出夸大的倾向的副产品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业品隐含的平减指数持续上升幅度小于工业品出厂价指数的上升幅度,工业品出厂价指数是在对包括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产品的样本进行价格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

表 2 说明工业部门计算实际增加值时面临的困难。(一)部分为从不同来源得出的五个工业品价格指数。第一列是来自官方 GDP 资料隐含的平减指数。它是根据工业部门名义的和实际的增加值计算而成的。第二列也是一个隐含的平减指数,它是由官方名义的和实际的工业总产出资料计算来的。第一列和第二列之间的基本对应,说明后者的使用增加了名义增加值。而且第二列是两个隐含平减指数的加权平均数,即是由第三列和第四列分别反映的国有企业产品平减指数和集体工业企业产出的平减系数的加权平均数。第三列和第四列由工业企业上报的按现价计的和按基价计的总产值导出。第五列是出厂价格指数。值得重视的是:1984 年后,集体企业的平减指数与国有企业的工业品平减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指数以及消费品价格指数(没有显示)相比,增长是不寻常的缓慢。在 1990—1993 年期间,集体企业工业产出平减指数上升了 6%,而国有企业工业产出平减指数上升了 35%,工业品的出厂价指数上升 41%,消费品价格指数上升 26%。这些数据支持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因为上述给出的原因,集体企业工业部门的增加值(特别是近期)显然被夸大了。

表 2 的(二)部分显示了工业部门按(一)部分五种价格指数测量的不同增加值水平。(三)部分给出了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根据官方资料,1993 年的实际增加值是 1978 年的 5.1 倍,但是用出厂价重估实际增加值时,它只是 3.5 倍。这种区别是日益夸大的集体企业工业产出和集体企业工业占总产出比例快速增长相互作用的结果。

如果出厂价指数是正确的,那么从表 2(三)部分的第一、第五列可以看出,1993 年工业部门的官方增长率比实际增长率夸大了 10 个百分点。因为工业部门是 GDP 增长的最大贡献部门。从表 1 的第三列可以看出,在出厂价基础上重估实际的工业产出价值,1993 年 GDP 增长率将从官方的 13.4% 降低为 8.9%。由于基年变化和对不合适的工业产出平减指数的调整,1979—1993 年期间的 GDP 增长率如表 1 第三列所示。重估工业产出的重要结果是:在 1978—1984 的年均增长率到 1985—1993 的年均增长率之间,也许没有加速增长。不适当的工业产出平减指数可能使 1985—1993 年年均增长率增加了多达 1.9 个百分点。<sup>①</sup>

有必要指出本文没能证明官方对非国有工业产出的测估是错误的,因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间的贸易条件没发生变化的命题没能得到证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出可能是互不相同的、互不替代

<sup>①</sup> 由于四舍五入误差,这里的数字与前面隐含的数字不同。

的,这导致非国有企业发展越快则贸易条件对非国有企业的产出就越不利。而且,本文也没证明出厂价格指数是可用的正确的价格指数。

假定数据资料问题在上面已得到论证,我们可看出,平均 GDP 增长和平均 TFP 增长百分点的估计方法不及对各自可能范围进行估算的方法,在该范围内包含了真实情况,本文将进行点估算及其范围。简言之,本文承认这些非常显著、并为中国国家统计局所承认的数据估算问题,并试图估算这些数据问题的大小。对待先前 GDP 增长率(及随后估计的 TFP 增长)的正确方法是把它们作为各自可能范围的上限或下限,真实 GDP 和 TFP 就在此区域内。GDP 增长的最高限额估计值由官方数据提供(以一致的基年计算),估计值的最低限额从经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后的工业产值计算得出。<sup>①</sup>

倘若存在多种导致 GDP 增长率估计值不同偏向的因素,我们必须牢记本文的目的是给出平均 GDP 和 TFP 增长率的各自可能范围,而非只是对其进行估计。贸易条件可能的确对集体工业产品不利,因此,采用出厂价指数将低估工业产出的数量。但是,中国数据搜集方面的改进将通过把现存活动归于新的经济活动来扩大产出增长。

## 二、增长阶段

根据增长源泉,中国的经济增长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1979—1984 年间,此间农业部门是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农业部门的广泛市场化是始于 1978 年底的农业非集体化和扩大农业市场。一些生产刺激(主要是留利和奖金)在改革的第一阶段被引入到第二、第三产业中来。1979—1984 年的年均增长率是 8.8%,农业和工业对产出扩张的贡献基本一致,分别是 32% 和 34%,参见表 3 的第一部分。

表 3 各部门(包括工业部门的各类所有制)对 GDP 增长率的贡献份额  
单位: %  
(一)以 1990 年价为基价采用官方数据

部门贡献	第一产业	工 业				建筑	第三产业
		国有	集体	个体	其他		
1979—1993 年	16.51	13.79	25.02	5.91	6.93	5.70	26.14
1979—1984 年	31.77	20.32	12.82	0.17	0.77	5.22	28.93
1985—1993 年	11.62	11.70	28.93	7.74	8.91	5.85	25.25

(二)用出厂价指数对工业产业进行再测算后的数据

	第一产业	工 业				建筑	第三产业
		国有	集体	个体	其他		
1979—1993 年	18.79	12.90	20.28	5.36	6.44	6.49	29.75
1979—1984 年	29.25	21.84	16.24	0.20	1.02	4.80	26.64
1985—1993 年	14.30	9.08	22.00	7.56	8.76	7.21	31.08

第一阶段的高速增长导致 1984 年中期第二、第三产业部门更广泛的自由化。最激进的自由化发生在农村领域,对公社所有的生产单位——乡镇企业创办的限制被取消了。主要聚集在城市地区的国营企业也被给

① 这里需要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GDP 水平估计值和 GDP 增长率的估计值间的关系。众所周知,GDP 的真正水平可能被官方数字压低。但对 GDP 水平的低估并不必然意味着官方增长率是低估的。除非能证明 GDP 中未测算部分比测算部分增长更快,否则我们不能断定官方增长率也被低估。事实上倒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未测算过的经济活动意味着改进着的统计报告制度应将其包括在内,把这些已存活动作为新活动,从而扩大了增长率。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数据报告体系的改进,低估的 GDP 水平很可能导致对 GDP 增长率的高估。

予了自由，使其从工业管理部门的控制中脱离出来，获得了一些决策权。

第二阶段 1985—1993 年的年增长率是 9.4%，工业产出增加了 57.5%；第三产业部门的贡献度大大超过了第一产业，二者之比为 25%：12%。对 GDP 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是集体工业企业部门，29% 的贡献率。私营工业企业占总产出增长 8% 的份额。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经过用出厂价格对工业产出再测算后，原有的关于 1985—1993 年增长源泉的观点依然成立，参看表 3 的第二部分。这里，工业在产出扩张中占 47%，第三产业占 31%，第一产业占 14%。工业部门仍是增长的主要动力，非国有企业仍占领导位置。

自 1978 年（甚至 1984 年后依然）来，工业部门对 GDP 增长的带头作用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属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第三产业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异常巨大，但中国经济处于从传统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认为服务企业“无生产力”，因此就控制其发展。1978 年后服务业部门的迅速发展恰恰反映了由于先前控制导致的服务部门相对欠发展状况。

### 三、增长机制：来自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再配置

经济增长以三个部门为基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正如中国的统计数字所示。每个部门都可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不同之处仅在于商品增值系数  $\alpha_i$  的不同。结果是：

$$Y = \sum (\alpha_i X_i^\beta Z_i^{1-\beta})^{W_i} L^\beta K^{1-\beta}$$

其中： $Y = \text{GDP}$ ，  $W_i = \text{部门 } i \text{ 占 GDP 的份额}$ ，  $X_i = \text{部门 } i \text{ 占劳动力的份额}$ ，  $Z_i = \text{部门 } i \text{ 占资本存量份额}$ ，  
部门 1 = 第一产业（农、林、渔业）， 部门 2 = 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 部门 3 = 第三产业。

GDP 增长可被分解为几个部分，它们源于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

$$(dY/Y) = \beta(dL/L) + (1 - \beta)(dK/K) + \beta \sum W_i(dx_i/x_i) + \sum W_i(d\alpha_i/\alpha_i) + (1 - \beta) \sum W_i(dz_i/z_i)$$

其中：TFP 增长 =  $\beta \sum W_i(dx_i/x_i) + \sum W_i(d\alpha_i/\alpha_i) + (1 - \beta) \sum W_i(dz_i/z_i)$

TFP 的增长可分为劳动再分配效应和净 TFP 增长，劳动力再分配效应 =  $\beta \sum W_i(dx_i/x_i)$

净 TFP 增长 =  $\sum W_i(d\alpha_i/\alpha_i) + (1 - \beta) \sum W_i(dz_i/z_i)$ ，净 TFP 增长是包括技术进步的剩余。

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大部分是农民，1978 年时，1/3 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所以这里单独将劳动力再分配提出来研究。劳动力过剩这一特征使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与前苏联东欧的（CEEFSU）经济转轨很不相同。具体而言，中央计划国家市场化，对一个 CEEFSU 国家意味着正常的经济发展，但对中国则意味着结构调整。当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量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边际产量时，部门间的劳动力转移（从农业中出来）增加了总产出量，Chow（1993）发现 1978 年劳动边际产品价值在各部门分别是：农业 63 元，工业 1027 元，建筑业 452 元，交通运输 739 元，商业 1809 元。

依据前面分解方程可得： $\beta \sum W_i(dx_i/x_i) = \beta \{ [(W_2/x_2) - (W_1/x_1)]dx_2 + [(W_3/x_3) - (W_1/x_1)]dx_3 \}$   
重新配置从农业中流出来的劳动力 ( $dx_2 > 0$  和  $dx_3 > 0$ )，将产生一个正的劳动配置效果，条件是：

$(W_2/X_2) - (W_1/X_1) > 0$ ，部门 2 的劳动生产力高。

$(W_3/X_3) - (W_1/X_1) > 0$ ，部门 3 的劳动生产力高。

如果有充足的资料我们可将前面的分解公式修正得更完善，净 TFP 也可被进一步细分。例如，获得部门间的资本流动的贡献，以及所有权结构变动的贡献。然而，所有这些都需要进行大胆假设，前者需要有关部门资本分配的资料，后者需要有关每个部门由所有者变动导致的资本和劳动分配的资料。

我们也可以将不同的  $\beta$  用于每个部门的生产函数，从而得到分解方程： $(dY/Y) = (dL/L) \sum W_i \beta_i + (dK/K) \sum W_i (1 - \beta_i) + \sum W_i \beta_i (dx_i/x_i) + \sum W_i (d\alpha_i/\alpha_i) + \sum W_i (1 - \beta_i) (dz_i/z_i)$

然而，由于有关部门资本存量分配资料的不可靠性，而对各部门  $\beta$  的估算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因此本文

通过假设有关  $\beta$  的不同值而计算出一个关于 TFP 增长的范围。根据有关中国生产函数的文献,我分别假定  $\beta = 0.4, 0.5$  和  $0.6$ <sup>①</sup>。给定资本积累的速度高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那么,  $\beta$  的值越高, 资本对增长的贡献就越低, TFP 的增长率就越高。我根据 Li 先生(1992)对资本存量的估计考察增长。分析中, 我用复合增长率替代算术平均增长率。<sup>②</sup>

有关增长的测算是通过对整个 1979—1993 年期间和对两个分阶段 1979—1984 年和 1985—1993 年分别计算展开的。对这两个分阶段的描述是与下述两者一致的:一是政府政策朝着对非农产业部门加速改革的方向转变,二是把工业作为无可争议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985—1993 年间的成长绩效可能是理解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一个更好的指标(比整个期间要好)。这是因为未来中国的增长很可能象 1985—1993 年间一样由非农部门带动。

表 4 说明了每个因素对增长的贡献。我们通过测量实际工业产出的两种方法(官方方法和出厂价方法)和三个  $\beta$  值( $0.4, 0.5$  和  $0.6$ )来得出每个要素贡献度估计值的范围。中国的高投资率和低初始资本存量导致 1979—1993 间资本存量年增长 9.8%。资本积累使 GDP 增长了 3.9%—5.9%;劳动力规模扩张使 GDP 增长 1.1%—1.6%。这意味着 1979—1993 年间 TFP 增长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 1.1%—3.6%。

表 4 中 1985—1993 年间的资料很有意思,在此期间,工业成为增长的主要动力,资本积累对增长的贡献率由 1979—1984 年间的 3.2%—4.9% 增加到 4.4%—6.6%。TFP 增长下降是真实的,它不是因为资料调整和不同的  $\beta$  值。当  $\beta = 0.5$  时,根据官方 GDP 资料算出的 TFP 增长率由 3.2% 下降为 2.4%。当用出厂价平减工业产出和设  $\beta = 0.4$  时,TFP 增长率下降最大,从 1979—1984 年间的 2.8%,降到 1985—1993 年间的 -0.1%。

表 5 把 TFP 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再分配和净 TFP 增长率。需要注意的是有关部门间劳动分配的官方数据应严谨使用。对农业劳动的官方估计是建立在户口登记基础上的,由于农业人口流动,尤其是流向沿海的乡镇企业,所以该估计是过高估计值。官方对该流动人口的估计是 8000 万,而世行的估计则为 1.5 亿。官方估计(8000 万)不包括在其本地区内的 2000 万流动人口。<sup>③</sup> 鉴于这种资料性问题,我们设计了两组劳动力再分配效应和净 TFP 增长率的数值。在表 5(一)中是通过使用有关部门间劳动分配的官方数据来给出劳动再分配效应的最低值。表 5(二)假设自 1984 年来移民为 1 亿,其中 60% 移民都有工业就业机会。<sup>④</sup>

表 4 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 GDP 增长的贡献 单位: %

(一) GDP 的复合增长率(已用 1990 年价重新调整相一致的官方的 1978—1993 年数据)			(二) GDP 的复合增长率(用出厂价指数重新平减过的工业增加值且也用 1990 年价重新调整)		
平均	1979—1993	9.11	平均	1979—1993	8.02
平均	1979—1984	8.75	平均	1979—1984	8.84
平均	1985—1993	9.34	平均	1985—1993	7.47
复合增长率			对增长率的贡献		
			$\beta = 0.40$	0.50	0.60
(三) 资本积累对 GDP 增长的贡献			5.88	4.90	3.92
平均	1979—1993	9.79			

<sup>①</sup> 例如, Chow(1993, PP. 827)得出总量生产函数中  $\beta$  约为 0.4%;胡永泰等(1994)估算在国有工业企业中  $\beta$  为 0.54, 乡镇企业为 0.60。

<sup>②</sup> 它们间的区别是很小的.GDP 的复合增长率比简单算术平均增长率稍低大约 0.05%。

<sup>③</sup> 《远东经济评论》,1996:“不可压制的力量”,4月4日。

<sup>④</sup> 官方估计流出其居住地的 8000 万,加上在其居住地范围内流动的 2000 万。



平均	1979—1984	8.08	4.85	4.04	3.23
平均	1979—1993	10.96	6.58	5.48	4.38
(四) 劳动力增长对 GDP 增长贡献					
平均	1979—1993	2.73	1.10	1.37	1.64
平均	1979—1984	3.09	1.24	1.55	1.85
平均	1979—1993	2.51	1.00	1.25	1.50
(五) TFP 增长对 GDP 增长贡献(用官方的工业增加值数据)					
平均	1979—1993		2.14	2.84	3.55
平均	1979—1984		2.67	3.17	3.67
平均	1979—1993		1.77	2.61	3.46
(六) TFP 增长对 GDP 增长贡献(其工业增加值用出厂价指数平减)					
平均	1979—1993		1.05	1.75	2.46
平均	1979—1984		2.76	3.26	3.76
平均	1979—1993		-0.11	0.74	1.58

表 5 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为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和净 TFP 增长 单位: %  
用官方工业增加值数据的 TFP 增长率 由经出厂价指数平减过的工业增加值得到的 TFP 增长率

$\beta =$  0.40 0.50 0.60 0.40 0.50 0.60

(一) 分解 TFP 增长率(不考虑迁移)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

平均 1979—1993	0.48	0.61	0.73	0.50	0.62	0.74
平均 1979—1984	0.57	0.71	0.85	0.60	0.75	0.90
平均 1985—1993	0.38	0.48	0.57	0.39	0.49	0.59

净 TFP 增长

平均 1979—1993	1.65	2.24	2.82	0.55	1.13	1.71
平均 1979—1984	2.10	2.46	2.82	2.16	2.51	2.86
平均 1985—1993	1.38	2.13	2.88	-0.50	0.25	1.00

(二) 分解 TFP 增长率(假定迁移从 1984 到 1993 年为 1 亿)

劳动力再配置效应

平均 1979—1993	0.85	1.06	1.28	0.88	1.10	1.32
平均 1979—1984	0.57	0.71	0.85	0.60	0.75	0.90
平均 1985—1993	1.04	1.30	1.56	1.08	1.35	1.62

净 TFP 增长

平均 1979—1993	1.29	1.28	2.27	0.16	0.65	1.13
平均 1979—1984	2.10	2.46	2.82	2.16	2.51	2.86
平均 1985—1993	0.72	1.31	1.89	-1.19	-0.62	-0.04

计算中用到了这一时期的平均产出额。

表 5(一)表明: 劳动力再配置对 1979—1993 年经济增长只添加了 0.5 到 0.7 个百分点。而且, 它还表明劳动力再配置作用在其后的 1985—1993 年更弱。这更小的劳动力再配置作用与明显增长着的农业劳动力外流恰好相反, 特别是 1984 年以后, 政府管理乡镇企业(TVEs)创办和活动的规则逐步放松, 如乡镇企业从 1987 年后可以自由地直接加入国际贸易。这种矛盾表明: 部门间劳动力分配的官方数据必须调整以反映出已经发生过的人口迁移, 那就是, 至少要利用官方对流动人口规模的估计。



表 5(一)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表 4 中已观察到的 1985—1993 年 TFP 的降低不能用劳动力再配置作用的递减来解释。当不管  $\beta$  的值,且利用官方 GDP 数据和官方部门劳动力分配数据时,净 TFP 在 1985—1993 年下降。简言之,发现这一段时期技术进步降低是非常有洞察力的。

表 5(二)表明:劳动力再配置作用提高了 GDP 增长率,使之在 1979—1993 年增长了 0.9%—1.3%,在 1985—1993 年增长 1.0%—1.6%。结果是净 TFP 增长就整个时期而言增长了 0.2%—2.3%,在 1985—1993 年增长了 -1.1%—1.9%。

从表 4 和表 5 中,我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在 1985—1993 年中,出现三例净 TFP 增长为负值的现象,表明利用出厂价指数可以理解真实的工业产出量。乡镇企业产出的爆炸式的增长可能恶化其与作为对手的国有企业产出的贸易条件。1985—1993 年 GDP 增长可能被低估 0.9%—1.2% 而不是利用出厂价所得到的 1.9%,这是有可能的。<sup>①</sup>

第二个结论来自于很有用的发现:第二期较低的净 TFP 增长是自然的,速度的降低反映了这样的事实,由于“1978 年改革”释放出来的 TFP 增长的一部分是经过长达 10 年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央计划的过度管制之后,在经济效率上的一次恢复。农业改革构成了初始高的净 TFP 增长的大部分。

第三,当考虑到迁移,来自农业中的劳动力再配置构成了 TFP 在整个时期增长的 37%—54%,在第二个时期 TFP 增长的 45%—100%。而这仅占到美国(1948—1969 年)TFP 增长的 13%(Denison, 1974, pp. 127)<sup>②</sup>。劳动力再配置在中国的巨大作用反映了中国存在大量劳动力从事低生产率的农业,和 1978 年后中国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创造高生产率就业机会上进行改革的成功。

简单概括这个估计区域,我认为(官方)的 1985—1993 年 9.7% 的年增长率,可以合理地分解为:

0.9%—1.2% 来自不适当的平减,0.4% 来自不一致的基年的利用,5.5% 来自资本存量的增长,1.1% 来自劳动力的增长,1.2% 来自劳动力的再配置,0.3%—0.6% 来自其他要素。

必须强调的是:对 TFP 增长、劳动力再配置作用、净 TFP 增长估计的上述百分点,应与表 3 的估计区间联系起来考虑。因此,可以确信的是:对中国增长绩效的近期考察已经得到与上述结论相差无几的估计。Borensztein 和 Ostry(1996)已经测算出,1979—1990 年劳动力再配置的作用约为 1%,TFP 增长的合理区间应在 -1.0%—3.8%。

低生产率的农村劳动力这个大“贮水池”,我认为从中期来看,占 1.2% 的劳动力再配置作用对 TFP 增长有着支撑性的贡献,而且,我认为,直到政府在“九五”中成功地实现了意义深远的改革,改革 1985—1993 年的经济政策体制,最高可持续的 TFP 年增长率可能低于 2.0%。

#### 四、对增长的解释

高的资本积累(对中国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其基础在于劳动力剩余经济的自由化,该经济有较高储蓄率。投资回报很丰厚,因为剩余劳动力阻止了实际工资大幅度提高,国内储蓄的“大水池”阻止了利率的上升。后者的重要性很易观察到:居民储蓄在中国大约占到其可支配收入的 23%;而在日本,占 21%;在台湾,占 18%;在比利时,占 16%;在西德,占 13%;在美国,占 8%。(世界银行,1990,表 4.9)

除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之外,还有两个其他初始条件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第一个辅助性的初始条件是:中国中央计划的程度较之苏联和波兰小得多,钱颖一和许成钢(1993)指出,大约有 2500 万种商品进入苏联经济计划,而在中国,仅有 1200 种商品包括在计划内。第二个辅助性条件是中国的改革不象波兰和苏联的改革,不是在宏观经济出现大的不平衡和严重的外债危机从而要求实行严峻的计划时开始的。

① 净 TFP 增长在 1985—1993 年这一时期区间分布为 -0.3%—1.2%。

② Denison(1974, pp127)报告认为:美国在 1948—1969 年国民收入年增长 3.85%,TFP 增长 1.75%,来自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再配置为 0.23%。

在中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背后,另一个关键性要素是融入全球经济。这个因素通过四个渠道发生作用。第一,以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打进国际市场,加快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流向高生产率的工业。第二,中国现在可以买到现代技术(有些技术在以前是不对中国出售的)。第三,是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资本存量,转移了新的技术,创造了可以利用的全球分配网络,国内企业引进了更有效率的经营管理。第四,全球贸易竞争迫使中国企业更富有效率和创造性。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高居民储蓄除了能形成高资本积累率外,还有助于稳定经济。通过两条渠道减少中国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第一,通过银行的储蓄流可以满足来自国有企业方面对资源的超额需求,降低了对印刷纸币的需求。第二,因为货币(直至现在)在中国是金融储蓄的最重要的形式,高储蓄率意味着对货币的日益增加的需求,这样就可减弱通胀压力,这种对通货膨胀减弱作用可从  $M_2/GDP$  从 1979 年的 38% 上升到 1992 年的 106% 的现象中看出来。

## 五、挑战和未来增长预测

剩余劳动力经济的自由化是中国引人注目增长的根本原因,由经济自由化所支撑的经济效率提高已至极点时(如农业非集体化和乡镇企业的建立),随着自由化速度放慢,经济效率提高也会变小(如国有企业)。

这样,我们可以很好地预言中国经济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将是“九五计划”的核心,改革方向早在 1993 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确定下来了。那“九五”计划中,32% 的固定投资比率如何与 8% 的增长目标相兼容?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注意到 1985—1993 年的经历是:平均 29% 的投资/GDP 比率创造了 11% 的资本存量增长率(此处的“投资”仅指固定资本形成)。

使用公式:  $(dk/K) = (I/Y)(Y/K) - r$

这里:  $K$ =资本存量,  $I$ =固定投资,  $Y$ =GDP,  $r$ =折旧率。

若采取 5% 的折旧率,可导致 1.8 的资本/产出比率。

我假定在“九五”中:1. 名义产出缩减不够得到修改,2. 劳动力再配置作用 = 1.2%, 3. 净 TFP 增长 = 0.4%, 4. 劳动力增长 = 2.0%, 5.  $(K/Y) = 2.0$ , 6.  $\beta = 0.5$ , 7.  $r = 5.0\%$ 。则若  $I/Y = 32\%$ ,  $dk/K = 11\%$

然后,我们使用:  $dY/Y = \text{资本贡献} + \text{劳动贡献} + \text{TFP 增长} = 5.5 + 1.0 + 1.6 = 8.1\% > \text{目标 } 8.0\%$

在过去增长的基础上,我可以说:中国政府几乎可以保证达到 8.0% 的增长目标。实际上,如果“九五”计划中关于深化企业方面的改革和提高中国的对外开放的设想得到完全贯彻,我还大胆地预测:32% 的固定投资率将产生平均 9% 的增长率,因为在 1979—1984 年这一段时期出现过 TFP 大幅度提高的情况。

## 参考文献

- 胡永泰等, 1994: “中国企业改革究竟获得了多大成功”,《经济研究》第 6 期。
- Borensztein, Eduardo and Jonathan Ostry, 1996,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Perform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 Chow, Gregory, 1993,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August.
- Denison, Edward, 1974, “Accounting for United States Economic Growth 1929—1969”,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 Li, Jingwen, 1992, “Productivity and China’s Economic Growth”, *The Econom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4, December.
- Qian Yingyi and Xu Chenggang, 1993,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 1 No. 2, p. 135—170, June.
- World Bank, 1990, “China: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and Industrial Growth under Decentralized Socialism”.
- World Bank, 1992, “China: Strategies for Reducing Poverty in the 1990s”.

(翻译:北国)(校对:申炎) (责任编辑:王沂)(校对:水)